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和平新闻学

严怡宁, 郑圆圆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和平新闻学在反思西方新闻业战争新闻取向的基础上, 力图构建一个旨在解决冲突、结束暴力的新闻范式。“战争新闻”与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一脉相承。在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下, 国际合作受到限制, 国际冲突不可避免, 战争新闻则成为暴力冲突的助推器。“和平新闻”强调对冲突的非暴力反应, 却因镶嵌于西方的结构性暴力而遇到发展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规范性国际关系理论, 能够超越西方国际关系认知, 其力图构建的新型全球体系可以提供作为规范性新闻理论的和平新闻学所需要的和平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 应进一步发展规范性国际新闻传播理论, 通过突破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 构建新型国际新闻传播知识体系, 从而使和平新闻学的局限性问题的根本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些成功实践也给和平新闻学建设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希望。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新闻学; 西方国际关系; 战争新闻; 发展规范性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3) 04-0043-07

和平新闻学是倡导化解冲突暴力、解决冲突问题的建构性新闻范式, 是对隐藏在西方新闻客观性外衣下“战争新闻”的反思和颠覆。“和平新闻”与“战争新闻”的分歧指向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认识论, 而和平新闻学在西方价值体系下也因难以获得系统性的支持而陷入困境。在当今世界体系转型, 全球呼唤新型价值观和治理体系的趋势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带来了突破西方传统理念局限的可能性, 也力图解决冲突的和平新闻学摆脱传统西方价值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可能。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与“战争新闻”框架

(一) 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下冲突的永恒性

在以权力为核心的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框架下, 国际冲突和战争成为必然, 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国家具有自私的本质, 国际和平无法依靠国际合作来实现, 只能依靠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均势体系来达到暂时的各国力量的平衡和稳定。而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结构仍然是无序的, 国家行为体依旧是理性和自私的, 在利益分配上是零和游戏, 因而国际合作从根源上受到限制, 国际冲突仍然无法避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反映的是目前国际体系既有的不平等现实, 无法指出应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未能有效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等此起彼伏, 频频出现全球治理失灵的问题。

新自由制度主义希望通过强调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作用, 来避免国家间冲突, 达成共同的收益。但是该理论并没有认识到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部分, 不仅无法解决强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对国际社会的非法干预, 更无法解决霸权国家通过控制国际制度来维护霸权, 从而形成

“制度霸权”的问题。以联合国为例,尽管它是最权威的全球治理机构,但在大国的权力博弈中联合国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从而无法切实有效地应对诸如维护世界和平、化解难民危机及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

建构主义强调观念、文化等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对互动形成共有观念的强调解构了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先验性。但其对政治文化的划分回避了国家等级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霸权国家与弱势国家在互动中的地位、作用等都被忽略了。国际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无法得到体现,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和共有观念中实际存在的文化霸权、观念霸权被视而不见。

世界体系论更是承认了霸权国家的核心地位。尽管该理论认为国家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是可以变化的,但其认定的中心—边缘—半边缘结构本身就承认了国际体系既定的不平等秩序,其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仍然折射了“西方中心论”的底色。同时由于过度强调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使之陷入消极悲观主义的困境,导致看不到世界体系优化的方向。

(二)“战争新闻”——暴力冲突的助推器

媒体系统本质上与政治系统和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因此战争新闻也成为西方主导的新闻报道框架。在新闻选择时,西方主流媒体倾向于用战争和暴力来建构新闻。^[1]他者则被视作陌生人或者其他群体的成员,“他”“我”之间泾渭分明的二分法大行其道。^[2]在报道冲突时,新闻媒体通过制造对立,采取“好与坏”的标签,突出冲突的可见影响,煽动公众情绪,以此提升影响力并扩大市场。传统的战争新闻将胜利与否作为唯一需要关注的事,突出冲突的零和博弈,不深入研究冲突的深层结构及其根源,通过妖魔化语言塑造施暴者和受害者的敌我对立,强调“我们”和“他们”非友即敌的直接暴力。加尔通认为,战争新闻体现了战争/暴力导向、宣传导向、精英导向及胜利导向。^[3]在这样的导向下,暴力被赋予合理性,并被呈现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战争新闻还往往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挂钩,从而煽动公众对所谓“敌人”的仇恨。赫曼与乔姆斯基指出,在美国的媒介报道中,被“敌人”折磨的受害者被塑造为值得敬仰的受难者,而受到美国或其附庸国侵害的人们就毫无价值,甚至很少被报道,原因是被“敌人”侵害的受难者能激发美国人的仇恨,因此政府议程就能完美进入公众议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媒体的战争新闻为政府制造了共识。^[4]正如霍尔所说的,新闻媒体并没有生产关于世界的新知识,而只是在已有背景下强化对世界的认知。^[5]

在这种框架下,新闻媒体及其报道不仅对停止暴力、促进问题解决毫无作用,相反还助推了暴力的产生。在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下,主要的媒介资源都掌握在中心国家手中,边缘国家要被世界看见,被中心媒介曝光,通常是在发生暴力冲突的时刻。其结果就是——当某种声音或观点不能被世界听见,感觉被边缘化的世界某个角落就会诉诸暴力从而影响媒介议程。

二、和平新闻学对西方新闻业的反思及其理论与现实困境

在战争新闻取向,媒体与公众疏离,成为政客和利益集团的传声筒。这使得受众专注于冲突对立,而不知事件全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产生偏差,因此表露出对媒体的普遍不信任,西方新闻业整体声誉遭受冲击。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序言(1945年)所言,“既然战争始于人们的思想,就必须在人们的思想中构建和平的防御工事”。基于对西方新闻业的反思,和平新闻概念脱颖而出。和平新闻是新闻报道的另一种转向,代表一种超越传统新闻报道的新范式与新实践,为冲突报道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并力图创造赢得和平的路径。

和平新闻是在与“战争新闻”的二分法上树立起来的一种区别于传统战争新闻报道模式的新闻建构方式,最早由加尔通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和平新闻概念强调如何为整个社会创造机会以考虑和重视对冲突的非暴力反应。加尔通总结了和平新闻和战争新闻在四个导向上的本质区别——相对于战争新闻的战争/暴力、精英、胜利、宣传导向,和平新闻以和平/冲突、人文、解决(问题)、真相为导向。^[3]加尔通的和平新闻理论还强调以分析冲突的形式处理新闻报道,从而提供更多使冲突实现非暴力转化的可能性。和平新闻学学者肯普夫则提出了实现和平新闻“两步走”的动态方案:第一步的冲突报道要以降级为导向,要求报道与冲突各方保持临界距离;第二步是在停战或和平条约缔结阶段,报道要以解决为导向,目的是解构战争话语。^[6]可以看出,无论是加尔通相对静态的和平新闻概念,还是肯普夫更强调过程的概念,最终都是指向减少传统新闻的冲突升级倾向。

和平新闻的倡导者还在具体实践层面对报道冲突的新闻记者提出了具体的操作要求。1997年,加尔通和林奇等人主持了在英国南部阿普洛庄园的和平新闻会议,对职业记者进行和平新闻的早期教育培训。之后林奇等又将加尔通对战争/和平新闻的四种导向分类扩展为17种指标,基于此提出了对记者的建议,包括关注解决方案、报道冲突的长期影响、关注普通人、全面报道以及使用精确的语言等。^[7]

和平新闻学作为对传统西方新闻理念的颠覆,与西方价值体系有着很多无法兼容之处,因此甫一诞生就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

在西方价值体系下,媒体结构性地从属于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利益,将“我们”描绘成道德和正义的,而将“他们”描绘成邪恶和激进的,把战争描述为解决冲突不可避免的过程,以便维护精英的既有权力。正如和平新闻学学者指出的,西方社会存在一种结构性暴力。这是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关系的系统,它创造了人们无法消除的障碍,将一种无形的暴力形式建立在行为和思维方式中。而西方媒体正是结构性暴力体系的一部分,助推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8]与战争新闻依附于霸权并巩固霸权的生存基础不同,和平新闻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对霸权的挑战和超越,试图构建媒介霸权现实下的一种和平框架和战争批判。^[9]和平新闻学鼓励新闻记者摒弃超然的观察者角色,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承担为公益服务的角色,重塑新闻传播的功能。其还主张与客观性规则相比,新闻记者更应重视通过亲身参与的经历获得当地本土知识、个人证词和参与者的陈述,目的是“反对主流媒体的社会呈现及其报道惯例”^[10]。

向西方结构性问题宣战,成为传统西方价值体系一股逆流的和平新闻学毫无疑问遭受极大的争议,成为西方主流价值取向笼罩下边缘化的一种选择。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和平新闻容易被视为具有强烈价值判断的倡导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以及具有意识形态引导倾向的鼓吹宣传。而和平新闻倡导的做法也被批评为不遵守专业主义新闻的道德和规范,将记者变为事件的参与者,而不是客观的报道者,模糊了客观性与执见的界限。^[11]一些批评的声音还指出,和平新闻的倡导者往往寄希望于记者个人,而忽视了个体所赖以生存的新闻生产结构、特征和环境;内容上则往往停留于对当前冲突报道的批判,但对冲突却没有确切的界定,令和平新闻缺少特别清晰的边界。^[9]就具体实践而言,一些学者批评该理论过于理想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规范性理论框架,从而质疑和平新闻是否过于理性而并不实用。^[12]批评者指出,记者是在新闻机构、国家和国际制度的框架下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和平新闻的记者参与冲突报道的程度是有限的,会受到机构制度、国家政策以及国际法律的相关限制。^[13]哈尼奇将相关工作中的具体限制总结为人员不足、缺乏时间和物质资源、编辑程序和等级制度的限制、文本限制、信息来源的可用性问题、冲突现场和信息的可接近性问题等。^[14]还有学者指出,西方媒体记者在没有强大外部盟友支持的情况下,既没有足够的激励措施,也没有相对于雇主的自主权来改变

新闻的传播方式。^[15] 可以看到当战争新闻镶嵌于西方的结构性暴力中, 和平新闻学改变这种现状的努力不免会被理解为一种螳臂当车的悲壮。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超越西方国际关系认知, 为和平新闻学提供可以融入其中的和平文化

和平新闻学与西方新闻所处的暴力文化和媒介惯例的矛盾带来的困境, 也说明了和平新闻学的发展需要和平文化作为前提。^[1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规范性国际关系理论, 能够超越西方国际关系认知, 其力图构建的新型全球体系恰恰可以提供作为规范性新闻理论的和平新闻学所需要的和平文化。

首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追求国际体系的平等机制, 意在纠正霸权和强权, 指向和平新闻学倡导的突破精英利益和视角的和平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突破现存国际体系的不平等机制, 顺应国际社会的民主化诉求。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念或明或暗地支撑西方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性作用, 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被治理和被约束的对象, 在国际事务中的主体性地位被大大忽视。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应充当世界的中心,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应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世界各民族都是平等的文明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新型国际机制也不会只反映部分先行融入国际社会之国家集合体的意志和利益, 而会积极反映崛起大国、新兴国家等后来融入国际社会之国家集合体的意志和利益。^[16] 可以看到, 在对西方的权力中心论的摒弃上, 和平新闻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是完全自洽的。该理论努力打破传统西方新闻为精英利益服务的桎梏。在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下, 新闻机构迫于政治和经济的压力, 优先传达精英阶层的意见和议程, 无法充分为公共利益服务。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战争新闻, 以精英和胜利为导向, 披着客观性的斗篷, 在利益的驱使下, 受到精英的操控, 而精英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往往被忽视。^[17] 西方传统的媒体运作原则以权力、政治和利润的三角关系为主导。^[18] 而和平新闻学主张兼顾各种利益, 不局限于精英阶层和冲突双方的声音, 也反映普通民众的声音, 使得普通民众的话语得以表达; 不仅要报道优势意见, 也需要兼顾弱势意见。以人文为导向, 向精英导向的西方新闻观发出挑战的和平新闻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纠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

其次, 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西方中心的偏见, 追求开放包容, 指向了和平新闻学平等对待冲突各方、包容多元意见的和平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开放包容多元文化, 跨越了传统全球治理理念以西方为中心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偏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 国际体系应包容各种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习近平主席强调: “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 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 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19]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多元治理模式, 以多向度治理取代“单向度霸权治理”, 突破了唯一模式和唯一价值观的局限, 及其给全世界多个地区带来的混乱。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创造一个开放包容、丰富多彩的全球文明体系, 以全新的全球文明观, 超越了狭隘的文明中心主义, 对消解文明冲突、促进文明交流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20] 和平新闻学在跨越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容纳多种声音的层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统一。该理论倡导平等对待冲突各方, 以开放姿态包容多元意见, 追求共识而非分歧。和平新闻学反对只突出一方的错误和责任, 或只关注一方遭受的痛苦和恐惧, 也反对对任何一方失之公允的贴标签行为。和平新闻学提倡表达冲突中所有各方的意见, 为解决冲突、缔造和平、维持和平与发展提供创造性想法。^[21] 和平新闻学还倡导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 认为应将以往被排除在外的声音纳入

——不仅有男性, 还有女性; 不仅有异性恋者, 还有性少数群体个体; 不仅有白人, 还有其他种族; 不仅有成人, 还有儿童都应参与。^[22] 不同于战争新闻对各方之间差异的报道偏好, 和平新闻关注冲突各方的共同点而不只是分歧与争斗, 在新闻报道中力争求同存异, 将注意力引向共同目标。可以看出, 和平新闻学对西方精英导向的反思逻辑是完全能够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思西方中心的逻辑体系的。

再次, 人类命运共同体破除“零和游戏”、推崇协商协商路径的范式, 也指向了和平新闻学倡导以沟通对话促进冲突解决的和平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共商共建共享的实现路径, 超越了无政府主义竞争中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也有助于避免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商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共建体现了参与和责任担当, 共享则可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韧性。^[2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将竞争、对抗观念转化为对话、协商观念, 以合作共赢代替博弈冲突。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经济全球化更需要以加强合作来共同化解全球经济风险。面对这些需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了一种超越狭隘国家利益观的新型利益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 中国致力于建立危机管理和化解机制, 面对经济纠纷、政治分歧、领土领海争端、边境冲突等危机,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主张和平解决争端, 并将双边协商对话作为解决双边冲突和国际争端的重要途径。这些做法有利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消除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而在破除零和游戏、强调协商路径的维度上, 和平新闻也高度吻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平新闻非暴力反应的重要一环是鼓励冲突各方协商对话, 旨在通过新闻媒体渠道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开辟空间, 超越了战争新闻“我们”与“他们”的冲突对立。从对话的角度来看, 和平新闻的出发点是“以他人为中心”的伦理立场, 在这种立场中, 自我被要求为他人负责。^[22] 因此和平新闻力图改变暴力冲突中的自我与他者关系, 要求新闻工作者善于倾听“他者”, 通过对彼此的理解, 超越冲突双方身份和敌意的束缚。在自我和他者多声并存的情况下, 和平新闻将记者的作用定位于促进不同声音进行对话, 为冲突各方搭建平等对话的桥梁^[24], 认为记者不应该仅仅是冲突事件中记载者的角色, 更应该起到调解者的作用, 对冲突建设性地做出非暴力反应^[25]。和平新闻记者林奇等人就在和平新闻实践准则中指出, 要避免将冲突描述为非输即赢的双边对立, 应在了解各方真正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基础上评估和平的前景, 促进冲突双方的沟通对话。^[7] 很明显, 和平新闻就实践所讨论的其实就是新闻传播领域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规范。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下进一步发展规范性 国际新闻传播理论和相关实践

和平新闻学的困境源于无法与西方新闻学及其实践所依托的价值体系、政治体系相融合, 所以产生了种种矛盾和悖论, 争议不断。显然在西方既有的政治文化和治理框架下, 和平新闻学很难找到真正的出路。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之相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下, 和平新闻学理念和实践可以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和发展, 成为构建一个和平、平等、合作、发展、联通的世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个顶层体系还需要各个领域及层面的诠释、延伸和实践。在新闻传播领域, 尤其是国际传播领域, 我们也可以以和平新闻学为其中一种理论基础, 进一步构建规范性国际新闻传播理论并鼓励开展相关实践, 让国际传播更好地服务于不同国家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沟通、开放讨论和增进理解, 促进冲突和矛盾的和平解决, 实现和平文化的构建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首先,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 基于前人在和平新闻、公民新闻、发展新闻、建设性新闻

等规范性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拓展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想象空间,突破现有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体系,构建能够塑造和平文化及和谐世界的新型国际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的是改变世界的结构性暴力,我们已看到和平新闻学虽然也将解决结构性暴力视作根本目标,却受制于结构性暴力背后的政治经济系统。前文就提到和平新闻实践无法超越根植于西方政治经济的客观性报道要求,其结果就是一些学者仅仅将和平新闻视作完美遵循客观性等西方新闻学理论和实践原则的“好新闻”,这就注定了和平新闻学难以有进一步的出路。因为人们其实已清晰地看到客观性追求在西方新闻实践中往往止步于操作手法,仅仅用符合操作惯例的说词来为实际助长战争新闻的结果辩护和遮羞。此外,西方新闻学理论对新闻价值的推崇也使得战争新闻相较和平新闻更易成为获得采纳的叙事框架。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明显已很难助力国际社会的转型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新型国际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构建需求极为迫切。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的规范性国际新闻传播理论必将突破和平新闻学现有的一些局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方位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体系性布局,涵盖了各类可能的冲突领域,而且既可以涵盖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族裔,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涵盖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的冲突。目前很多和平新闻的研究还停留在对暴力冲突,尤其是战争新闻报道的聚焦,容易窄化视野和思路,为此加尔通提出应放大至各类对峙情况的广泛的冲突。^[26]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系性思考框架下,国际新闻实践可以进一步探究如何通过新闻报道搭建平台,促进这五个领域冲突问题的解决,推动人类社会全方位和谐平衡发展。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解决冲突作用明显,如毒品、气候、环保、疫情等问题,这也必将引领规范性国际新闻传播理论和相关实践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突破。

再次,就行动主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涵盖各个层次、各个类别以及各种立场的利益主体,国家、政府、媒体、机构、企业、个人都在其中。而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不同立场的各类主体都获得了发布相关信息并参与讨论和互动的机会。和平新闻学作为规范性理论往往对新闻记者提出建构和平的要求,但记者个人行动的实践局限很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将可以探寻以融合各种力量来解决冲突、构建和平的方式和路径,从而能够进一步探讨媒体和记者在这一过程中具体扮演何种角色、负有何种责任。在这样的语境下,新闻记者在建构和平中的角色和义务不会再被过度放大,从而招来认为其不切实际的批评。

由于中西价值观及新闻观念的巨大差异,长期以来中国与西方新闻界难以开展有效对话,而和平新闻学等规范性新闻理论让我们看到了西方新闻界和学界的反思,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融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对话交流以及未来合作的基础。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中国突破西方治理瓶颈,成功调停国际冲突、引导国际合作的实践也让和平新闻的努力看到了改变结构性暴力的可能。比如在中国斡旋调解下,伊朗和沙特在断交七年之久后达成和解,恢复外交关系;目前巴西也在认识到这种改变的可能后积极加入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列,试图与中国一起调停俄乌冲突。当这样的努力越来越被正视,并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媒体与新闻作为构建这一常态路径的一部分,也一定更容易实现和平新闻一直以来所追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Galtung, J. (2003). Peace journalism. *Media Asia*, 30 (3): 177-180.

[2] Said, E.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3] Galtung, J. (2006) . Peace journalism as an ethical challenge. *Global Media Journal: Mediterranean Edition*, 1 (2): 1-5.
- [4] Herman, E. & Chomsky, N. (1988) .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5] Hall, S. (1973) . A world at one with itself , In Cohen, S. & Young, J. (eds.) .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ss media* . London: Constable, 147-156.
- [6] Kempf, W. (2017) . Towards a theory and (better) practice of peace journalism.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16 (2): 1-16.
- [7] McGoldrick, A. & Lynch, J. Peace journalism. Retrieved Nov. 12, 2022, from https://www.academia.edu/44532373/PEACE_JOURNALISM_WHAT_IS_IT_HOW_TO_DO_IT
- [8] Galtung, J. (1969) .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 (3): 167-191.
- [9] 金苗. 和平新闻: 和平框架、战争批判、理论反思与变革契机 [J] . 新闻大学, 2012 (2): 136-143.
- [10] Atton, C. (2008) . Citizen journalism. In Donsbach, W. (eds.) .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5.
- [11] Bhowmik, S. & Beyene, Z. (2021) . International peace journalism (PJ) practice: comparing the levels of PJ awareness among Bangladeshi and Ethiopian journalis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56 (1): 42-55.
- [12] Hyde-Clarke, N. (2011) . Political posturing and the need for peace journalism in South Africa: The case of Julius Malema. *Communication: South African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37 (1): 41-55.
- [13] Tehranian, M. (2002) . Peace journalism: Negotiating global media ethic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7 (2): 58-83.
- [14] Hanitzsch, T. (2007) . Situating peace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studies: A critical appraisal.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6 (2): 1-9.
- [15] Hackett, R. A. (2017) . Can peace journalism be transposed to climate crisis news?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23 (1): 14-24.
- [16] 姚选民. 人类命运共同体: 跨越“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方案 [J] . 学术论坛, 2017 (6): 1-12.
- [17] Galtung, J. (1986) . On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worldwide security and peace. In Varis, T. (eds.) . *Peace and communication*, San Jose, Costa Rica: Universidad para La Paz, 249-266.
- [18] Aslam, R. (2011) . Peace journalism: A paradigm shift in traditional media approach.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17 (1): 119-139.
- [19]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N] . 人民日报, 2016-1-22 (1) .
- [20] 吴志成、吴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 [J] .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 (3): 4-33.
- [21] Shinar, D. (2007) . Epilogue: Peace journalism—the state of the art.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6 (1): 1-9.
- [22] Atay, A. D. (2016) . Communicating with the “other”: Peace journalism as a form of self - other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Media Ethics*, 31 (3): 188-195.
- [23] 宋才发.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解析及全球化治理探讨 [J] . 党政研究, 2019 (3): 54-64.
- [24] Ross, S. D. (2006) . (De) Constructing conflict: A focused review of war and peace journalism.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5 (2): 1-19.
- [25] 王钰. 和平新闻的理论发展与范式转型 [J] .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6): 70-75.
- [26] Galtung, J. (1998) . Constructive approaches to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Track Two*, 7 (4): 7-10.

[责任编辑: 谢薇娜]